

现当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散文生命美学传统的 当代传承

——以夏立君散文创作为例

彭嘉凝 张丽军

摘要：中国现代散文生命美学传统自鲁迅发轫。新世纪以来，文学对于万物生命的价值召唤，对于生命、文明和历史关系的思索，成为散文生命美学的创作机枢。夏立君散文借鉴并承续这一传统。他的散文拥有广阔的生命关怀意识，探寻生命本质的悲剧性，肯定生命的强力与创造性，建立以“时间”为符码的创作体系，在“大散文”和“小散文”合流中彰显独特的当代散文生命美学气质。

关键词：生命美学；现代散文传统；夏立君；当代传承

中国现代散文以五四“人的文学”观念为理论发轫，这并非偶然的文学事件，而是历史审美经验与启蒙现代性需求的辩证统一，它以本质上无可辩驳的“人”的发现及发展为精神旨归，开启了新文学绵延的脉络图景。“人的文学”表现出对于人文精神、生命本体的关注和重视，意味着人类生命意识的自觉苏醒。虽然散文概念伴随时代发展不断缔结和更新，但无论如何纠缠，其文体所内置的生命寻求意识始终不曾改变。美学则以理论的方式解释着人类生命自由自觉的活动过程。狄尔泰把生命当成世界的本源，齐美尔将“生命的超验”视为实现人生本质的美的行为，柏格森则提出了“美在生命的

绵延”，直接促成了现代“生成”论美学的总体转向。重视生命意志的生命美学发展至今已成为“关于人类生命的存在及其超越如何可能的冥思”^①，“它不是‘为生命’的美学，而是‘因生命’的美学”^②。回顾中国现当代散文发展史，其内容聚焦于客体书写，和外物对话的同时，

- ① 潘知常在进行学理建构时将“生命美学”回归到“哲学”的思考范畴中，认为美学不是去追问实体的美，以及作为反映的美感，而是对于生命的最高阐释，是关于人类生命的存在及其超越如何可能的冥思。参见潘知常：《生命美学》，第6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 ② 潘知常：《“生命”视界与生命美学》，《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始终坚守着对于人类自身生命活动的观察和叙写,而进一步深化为对于生命的理解、审美和阐释,这样的生命美学传统是当今散文需要关注的命题,也是亟需阐发、传承的美学经验。

山东日照作家夏立君现已出版散文集《心中的风景》(2003)、《时间之箭》(2008)、《时间的压力》(2017)以及《时间会说话》(2019)。四部集子的具体内容关涉童年记忆、亲人旧事、边关孤旅、历史人物等,其中很多篇目经过多年沉淀,由早期思考的内容延伸开去,持续深入,最终成为历经时间研磨的当代经典,体现出写作和思考的连贯性和深度聚焦特点。^①不论是面向自我成长经历的写心之作,还是深入古人生活的历史散文,夏立君都传达出强烈的生命意识。生命意识是人对于自身生命以及其他生命体存在的感受和思考,对于生命源头、存在状态以及归宿的探寻和认识,这种对生命的全面思索构成他散文独树一帜的生命美学。在谈及他的作品时,评论界一直从“时间”角度介入^②,的确,作家本人在后续创作中提炼出自身散文的关键词是“时间”,他认识到了时间的线性流动和不可逆转,所以认为人会因为“珍视时间而产生生存和存在的压力”^③。但其实在时间表层之下,作者本质上要讨论的还是对于生命的理解,即在无限时间和有限自我的紧张对立之中,人感受到生命的压迫感,以及冲破生命桎梏和枷锁,完成对现实超越的美学理想。这是本体生命意识统摄下才能引发的思考,恰如柏格森所说,“把时间看作是脱离生命意识而存在的东西,这是无法理解时间的真正本质的”^④,夏立君散文的生命关怀、对生命本质乃至生命哲学的思考,构成了创作的个性特色,成为当代中国散文的独特深邃的人文精神风景。

一、叙述传统:百年散文发展中的生命美学

从理论的发源来说,关注生命存在与意义的生命美学形成于20世纪初的西方世界,在“西学东渐”的思潮中,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悲剧美学观是对康德、叔本华所推崇生命美学的一次重要的“中式表达”,这种美学传统发展至今,学者潘知常已自觉将“生命美学”开门

立派,成为和李泽厚“实践美学”伯仲相较的美学范式。生命美学是关于自然生命存在及意义的审美诗学,其不言自明地涉及文学的本质性问题,即文学与人学的关系。因此,自五四新文学以降,关于生命意义、何为生命之美的思考就进入散文创作中,形成了具有连续性和传承性的生命美学叙述传统。

五四新文学散文自其诞生就显现出两条左右相别的美学脉络,其一是以鲁迅《朝花夕拾》、周作人小品文为代表的闲适美学传统,或称日常美学传统,这一传统由“开明”散文、“京派”散文、“论语派”幽默小品等接续发展,特点是流畅清新、自然琐细;其二是《野草》开创的生命美学传统,区别于传统文人气质的日常“小叙事”^⑤散文,鲁迅“托尼学说”影响下激烈痛苦的陈述是对人道主义及个人主义的歌哭和自剖,它在探寻生命本质的意义上与日常生活美学区别开来。鲁迅关于生命的美学表达因关乎心灵和灵魂的诘问,显示出深邃多义、复杂不确定的特点,他本人描述的生命存在状态处于新旧交替、尚未成型的变化之中,所审视追寻的是人类生命的终极孤独,以及在未来世界生命隐秘的可能性。开篇《题辞》就有对于生命、死亡与存在关系的佛家“大欢喜”论;《墓碣文》

- ① 如首部散文集《心中的风景》收录了《在西域读李白》《冰雪里的灵魂》,随着作家对问题的持续思考和对文章的精心打磨,最终写出了《李白:忽然来了个李太白》《李陵:冰雪里的灵魂》,收录在散文集《时间的压力》中,该散文集获第二届“《钟山》文学奖”、第二届“林语堂散文奖”以及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
- ② 代表性评论有张元珂《“时间”的空间表达与当代意识——论夏立君的〈时间会说话〉》《寻根、对话、识见与大文体实践——论夏立君〈时间的压力〉的精神品格与当代意义》,王成一、王均策《夏立君“时间”散文的现代艺术浅析》等。
- ③ 彭程、夏立君:《时间、历史、人性,文章的苍茫与细腻……——关于〈时间的压力〉的对话》,《文学报》2018年9月13日。
- ④ 杨寿堪:《时间是什么——剖析西方几位著名哲学家的时间观》,《湖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 ⑤ 指对民间、个人、日常事件的书写。陈晓明认为小叙事是“仅凭借文学叙述、修辞与故事本身来吸引人,来打动我们对生活的特殊体验”。陈晓明:《小叙事与剩余的文学性——对当下文学叙事特征的理解》,《文艺争鸣》2005年第1期。

中又有“决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①这样关于反抗生命虚无、追寻自我存在意义、关涉自毁与自新的文句；《失掉的好地狱》中以三界诸生完结轮回为故事本体，赞颂了生命的战斗与反抗本能。鲁迅“野草风”开创的生命美学传统融合尼采“生命强力意志”和佛家“空”的境界万象，奇崛独语式的风格显示了极高的写作难度和深度，也很难为同代及后人所继承。

生命美学的内涵包括了以“生命”为主题的叙事创作，它的前提是散文在内容上对于生命本身的冥思和追问。20世纪三十年代沈从文的散文创作带有儒家传统“天人合一”的生命意识，《湘行散记》自传式的叙述将生命与世情人事、自然万物融合起来，“建立起了一种天地万物与人合而为一的生气流动的现代生命形式”^②。萧红的《商市街》则描述生命体在饥寒交迫中的尊严和希望，营造了泥与土、挣扎和死亡抗争中不屈的生命美学。抗战时期，具有抒情哲思性质的散文走向沉寂，实用主义性质的杂文代替了精神高蹈的小品文，形而上的哲学玄思让位给了当下现实题材。巴金、何其芳、李广田、丰子恺等作家从个人对生命的思索转移到对家国命运的烦难忧虑，民族意识的觉醒使得作家控诉战争带来的无辜伤亡，往往在痛惜生命逝去和表达对殒身抗战者的敬意中思考生命意义，并赋予个人生命超越性的崇高价值。巴金在《废园外》中以花园的废弃和年轻生命的死亡为对照来表达对于生命的悲悯。另一方面，梁实秋《雅舍小品》、张爱玲《流言》则以个人生活的情趣消遣为叙事中心，美食、服饰、公寓等“物”代替了“人”成为审美对象，这些大后方作家重新回到了周作人的“美文”传统，呈现出“有生活美学而无生命美学”的创作倾向。当历史进入到共和国时期，新生政权对于国家政治文化的“一体化”倡导，宏观价值的家国政治认同是散文创作的中心，个人与国家的同构，劳动者的生命熔铸于国家建设是当时新的生命美学原则。杨朔散文就将普通劳动人民和时代精神联结在一起，个体生命只有承载社会主义理想才具意义，散文整体上追求昂扬明朗的美学风格。

这种状况到了20世纪九十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后才有了转变，巴金晚年的《随想录》以怀人忆事的方式进行生命的反思和忏悔，他在序言《没有神》中写道：“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③杨绛《洗澡》和《干校六记》以知识分子冷静和缓的笔调陈述巨大的时代悲剧，书写生命尊严所遭遇的漠视，将“大写的人”的孤愤和隐忍深刻表述。这一阶段重新以生命为视界，尊崇个人情感存在的合理性，探讨生命存在的价值和被压迫的自由，这也是作家以生命美学作为思考自我存在的审美救赎。

当代散文自新世纪以来对“生命”内涵的理解范畴有所扩大，在物质主义、工具理性泛滥的新现实之下，生态环境、疾病瘟疫、市场中心等问题冲击着现代人的生活 and 心灵。生命的美学探讨也不仅限于对人的存在的思索，还包含了对自然万物生命的珍视。迟子建（《哑巴与春天》《祭奠鱼群》《昆虫的天网》）、阿来（《大地的阶梯》《西高地行记》）、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李娟（《我的阿勒泰》《冬牧场》）等人的散文创作对人类之外的动物、植物生命进行美学召唤，显示出万物皆有灵的生命悲悯之心。李敬泽（《上河记》）、王尧（《我们的故事是什么》）、陈福民（《北纬四十度》）或是将学人与时代、历史合流，或是融通文学、历史、地方志等要素，在空间和时间、自我存在和历史规律的哲学宇宙中深入思考生命的形态、位置以及存在价值，是生命哲学的游迹。夏立君散文是在生态散文和历史散文综合之后的一种“接着写”，他对于生命的细微观察和深入追问赋予其作品内在的哲思味道，在传承前人对生命的思索的同时确立了自身的美学价值。

二、万物有灵：面向生命体的美善关怀

王兆胜在对新世纪二十年散文创作进行

- ① 鲁迅：《墓碣文》，《鲁迅全集》第二卷，第20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② 张均：《中国现代文学与儒家传统（1917—1976）》，第102页，长沙：岳麓书社，2007。
- ③ 巴金：《随想录》，第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总结时提出散文以“天之道”作为价值支撑的说法,认为近年来散文对于生命的理解从聚焦人的单向时空拓展到对天地万物的敬畏,追求一种宇宙平衡博大的生命气魄,这是“超出人的视域而进入天地情怀,从而获得一种所谓的‘天启’”^①。夏立君的散文写作自然也在上述时代潮流之中,在平视、理解和汇通生命视野的同时,也试图克服人自身的局限,更加倾向于表达对人类和其他有灵万物的关切和悲悯。

在对于人本身的关注中,夏立君陈述了生命的平等以及尊贵,文本中消弭了因金钱、地位、身体缺陷等因素造成的人与人的区隔,而是提取精神上“大写的人”,在一种开阔理性的立场上倡导人精神的自足和直立,反思现代人生命的萎靡和衰败,兼具批判性和建构性。如《生命的初衷》,他拥抱那些落入社会最底层的流浪的乞丐,想象着他们不确定的生活以及面对饥饿所呈现的勇敢,那些叫街者“似乎不是用喉咙在喊,而是用他饥饿的肠胃、用他的命来喊”^②。作者在对于常人和非常态生命的审视中,完成了对于人本身的思考:在城市化中麻木功利的庸人,早已经失去了生命本身的新鲜和热度,成了终身乞讨的精神乞丐。又如《傻子二舅》中,二舅因为智力问题在家庭里身份低微,命如草芥,他吃最差的饭菜,干所有的脏活重活,成为家里的顺民和奴仆。作者在聪明人大舅和傻子二舅的比照中赋予弱者以同情、强者以批判,但最终把人的生命放置在天地之间,发掘出傻子的可怜以及聪明人的可悲,磨平人与人的区分,还原了生命本质的平等。^③在夏立君的文本世界里,人本身就要有对于外表残缺、低微生命体的关注,这种仁慈和宽爱并非道德化的自我要求,而是发自本心对于生命的热爱和尊重,它让作家谦卑诚恳地认识到:他人的局限也许就是自己的局限,对待弱势生命的暴力其实是对于自身生命的践踏。

另一层是对于人类之外万物生灵的倾听和对视,夏立君把生态意识和生命意识结合起来,将心灵向大地、河流以及草木敞开,凝结其他生命形式和自身的紧密关系,表达对于生命的悲悯、讶异以及深切的感动。山东的沂河和沭河是他童年的生命河流,它们曾经清澈地收

纳少年的心事和童真,但当河流受到污染,生灵随之绝迹时,面向河流的污秽,作者用人的污秽表达痛心的忏悔(《生命中的河流》);在河西走廊,“沙漠棺材”将死亡、历史、岁月秘密保存,它对于生本身如此憎恨,而又对死亡之后的一切如此迷恋,但这就是一粒沙的职守和深情(《怀沙》);塔里木河岸的根系用沟壑勾勒出生命的战场,那些胡杨、红柳、梭梭等沙漠植物的根系积蓄着生存的力量,沉默地诉说着自然的智慧和永恒,也映射着人类生命的短暂和肤浅(《根》);站在大树下面对树木的诚恳和包容,作家时常感到人的自私和惭愧,树木的恩泽带来了生命系统的稳定,而人类却用强力处置着数不清年轮的生命(《大树》)。夏立君对于自然的悦纳和观察,正呼应了环境伦理学家所说的:“人应该有一种伟大的情怀:对动物的关心,对生命的爱护,对大自然的感激之情。”^④在夏立君的写作视野里,他者和自然外物所有的生命体都带来有关生命的精神感召和启示,它们庇佑了一个作家的心灵,成为其创作上的源泉活水。

当我们回到历史反思过去,古希腊“人是万物的尺度”在凸显个人意志的同时也分化了人与自然的原生共同体,而工业文明带来的阶级分化加剧了贫富差距,弱势群体的声音被遮蔽和消解。这样看来当代散文中倡导“天人合一”传统的回归,与其说是对人生命价值的重新发现,毋宁说在修正被机械工业时代异化了的人类精神。对于生命的重视复归了人文主义的传统,这种传统“尊重人之生命,也视宇宙万物为秉有灵性的存在而给予充分的尊重,祈求在彼此会通、契合的和谐中生息发展”^⑤。夏立

-
- ① 王兆胜:《新世纪二十年中国散文创作走向》,《南方文坛》2020年第6期。
- ② 夏立君:《生命的初衷》,《时间会说话》,第17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
- ③ 夏立君:《傻子二舅》,《时间会说话》,第29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
- ④ [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第2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⑤ 孔范今:《论中国现代人文主义视阈中的文学生成与发展》,《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

君散文把人和自然相互融合,善于在琐碎的日常生活和不受关注的人、物身上找到突破口,发掘出生命的诗意。这类关于日常体验的散文具有非虚构的视角,自身带有的本真属性强化了生命活动的机能,是作家在整理自己生命来路以及存在时的回忆片段。而对于生命的悲悯关怀,则是夏立君在反省下自觉完成的一场生命重建,它滋长着个体的人生体验和智慧。

三、向死而生:生命悲剧本质的审美超越

理解生命不只限于对“如何生,怎样活”的思考,还有对于生命本质的追问,以及对于生命归宿的理解。夏立君散文远取古人、近写今人,在贯通的时空之中回答宏大的生死哲学命题,试图完成对于生命悲剧性及无法避免的死亡的现实超越与升华。

在作家的生命哲学中,生命有着天然不可改变的深刻悲剧性,它天然带有的荒诞和虚妄让个体沉沦其中,无法赋予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和尼采的悲剧哲学类似,夏立君认为应当以审美的态度对待悲剧人生,感受痛苦的同时,让生命在悲剧中生发形而上的美感,通过审美活动实现对生命的超越,正是因为“自然的必然性的惩罚固然是严酷的,但却并不意味着生命的消解,只有驯顺地屈从才意味着生命的消解”^①。如在《时间的压力》中叙述司马迁受辱人生时,夏立君认为为李陵辩护而发生的宫刑意外彰显出命运的荒谬,但在荒诞之下,司马迁反抗式的自我证明让他穿越了精神炼狱。作家意在把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成就归因于宫刑劫难的触发,其接受生命本身就是悲剧的结论后,忧愤执笔反抗绝望。司马迁呈现出的生命美感是“带血的美”,肉身切割、灵魂升华后的撕裂美感,但也正是他的强力意志将悲剧变成生命行为的一场自救艺术,勇敢抗击命运任意性带来的伤害,通过人的自主选择抵达第二次生命,作家讨论的正是这种生命悲剧“如何转化”“何以升华”的现代性问题。屈原生命的悲剧性来自其存国执念,他无力抵抗宵小谣言,九死不悔的忠、不为名达的直反而成为被人攻击的靶子。夏立君以其诗赋为机杼,将怨怼的人生

经历融进作品的解读中,人生的失意与楚辞的诗意相交,在精神审美的层面上达成对于悲剧的化解。夏完淳的悲剧是正义的理想和民族信仰崩塌下的殉难,是主动持守文化身份的牺牲,这一悲剧源于对少年喋血的惋惜和崇敬。作家对他的审美是带有净化自身目的的,超越了对其他人物的情感浓度,在对悲剧美的审视中生发对于生命悲剧的阻止欲望。夏立君对传统文化中生命悲剧精神的指认与超越,正彰显了中国乐感文化背景下这些古人的先锋价值,这并非一种简单以西化中的挪用,而是面向生命本身发出的严肃追问。

生命存在即是悲剧,生命的终结也同样具有悲剧性,因为人无法面对自身的渺小和衰弱,终将被死亡的阴暗吞没。但是在夏立君的散文中,死亡成为人类存在的另一种方式,人类坦然承认了生、死的一致性,践行了海德格尔所倡导的“向死而生”,实现对于死亡向度的超克。夏立君在散文中记述了自己亲人的死亡过程,他们共同在中国的乡土伦理中完成尘土皈依。在孩子的世界里,父亲的去世往往象征某种根脉和传统的断裂,但在农村和草民的世界里,死亡并不可怕,而是一种完成,父亲自己叨念着:“快死吧,快死吧!死——了,死——了,死才是个‘了’哇!往那土里一躺,多熨贴呀。”^②或者是埋怨“我怎么还不死啊……找把刀把我这头砍了吧”^③。父亲和祖父没有宗教的生死观,却以民间的死亡视角把死亡轻描淡写成自然陨落的一个动作,这种民间经验是另一种粗粝的哲学语言,它把死亡带入并不神秘但却通达的境界,让人对死亡的无奈和无畏成为合理共存的悖论。母亲从二十年前开始缝制自己的送老衣,并且在老年时拒绝承认87岁的真实年龄(母亲死在87岁)。在对于母亲生命的回忆中,夏立君保留了散文需要的生活原始细节,以及介于俗常和哲思之间的美学基调,死亡只留下必要的

① 潘知常:《生命美学》,第97-98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② 夏立君:《你是我的爷》,《时间会说话》,第48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

③ 夏立君:《明天比今天少一天》,《时间会说话》,第53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

哀悼而非剩余的痛苦,老年人对于死亡的思想为青年带来的是亲切久远的回忆。从这样的角度看,农业文明背景下对死亡的理解或许更加接近古代生死平等、“于己无关”的死亡观。^①可见,夏立君深刻透视不同人的死,不同人死时或死后其他人的表现,面向自己的灵魂发出本质性反思,直指生命的本质:死亡是一个需要被透彻理解的终极命题,它站在生命远端指导着人类如何生存。

其实,不论是深刻认知生命的悲剧本质的,利用审美完成对于悲剧的消解,抑或是正视死亡的不可逆转和必然痛苦,将死亡划归为生命的另一形式,其本质上都在完成对生命本然的“超越”,这种超越意味着对生命自由的解放、生命意识的觉知,以及对生命有限性的转化。

四、走出时间:生命有限与无限的哲思考辨

人对生命的意识源于个体感受到了生命在流逝,时间的流动性引发了人对于生命有限的觉知。夏立君的散文以“时间”为美学和精神符号,通过时间意识触动了生命意识,作者在正视生命短暂易逝、强调珍视生命的同时,也赞美肯定生命的强力与创造性,表现为对生命有限性和无限性的哲学辩证思考。这也正是美学家潘知常提出的:“所谓生而有幸,是指人虽然必须承领生命的有限,但也正是这生命的有限逼迫人去孕育出一种东西来超越生命的有限,最终使生命的存在与超越成为可能。最终使人成为人。”^②生命的有限性痛苦和无限性希望,正是人类生命美学二律背反的奇观。

作者一直通过时间来强调生命的有限性,他自己说“我只恐惧时间”,这种对时间消逝的恐惧带给他沉重的负担,所以“时常产生时间上的‘紧迫感’。此生初衷为何?此生欲何为?是时间追问,也是自我追问”^③。在作者的散文中,时间以一种特定的姿态显示出对于生命体的压力,如《时间之箭》里作者浮游在孔子、玄宗、秦王与上帝间,用中华文明和欧洲、美洲文明进程参照宇宙的变化,看到了沉默宁静的时间的批判和暴力,虚空时间带来的能量,以诗化和哲理的语言揭露出时间的有限性。同时,作者

也反驳了时间的公平性,用时间错位、时间歧视将小人物和大人物的时间区别开来,揭示出时间之困。另一方面,作者也描写“少年时间”“中年时间”和“老年时间”对生命有限性的不同认识,以此佐证生命的流逝引发的对于生命珍视程度的变化。《一粒大豆的喜剧》用耳朵出豆苗来写外部世界对于少年的吸引力,它大到足够让“我”主动模仿弟弟把豆子塞进耳朵以获得出门就医的机会,在少年时间里,生命成为获取自由的工具,少年们不惜破坏它完成“到世界去”的愿望。中年时间里,作者在喀什东湖东岸,独自目送20世纪最后一轮太阳,在《世纪末的落日》中夏立君把目光重置到公元一千年的基督教世界,在物理时间穿透生命带来超验震撼的同时,思考着时间带来的风景。而在老年时间里,作者父亲在阳光下望天望地,感叹生命的美好,求求老天爷“你管怎么还得叫我再活两天”^④,这是老年对于生命的乞求。伴随生命剩余时间的减少,个体逐渐认识到了生命的珍贵,也更珍惜个人时间,夏立君在此提炼出每个人都无法走出的时间困局。

夏立君的生命哲学是建立在认知时间有限基础上的深入思考,他的散文赞美、肯定人生命的强力和创造力,鼓励个人跳出时间之外,获取永恒无限的生命。这首先表现在对于人本身的认可上,他有一篇别致的散文是《看人》,在沂蒙山的村子里经常有风尘暮年的老人站在村口看人,而母亲则在家里的阳台上看人。在把人物风景对象化的过程中,这些封闭在传统村落的人们在用一颗卑微却高尚的心看待世界,理解车水马龙和谈笑风生。“这辈子可见了人了。死

① 这里指的是庄子提出的“齐生死”的死亡观,以及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试图消除死亡的悲剧性和严重性,认为死对于我们无干,因为凡是消散了的就没有感觉,而凡无感觉的就是与我们无干的这一基本命题。

② 潘知常:《生命美学》,第19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③ 徐晓清、夏立君:《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夏立君:时间、空间、人间》,日照新闻网, http://www.rznews.cn/viscms/tri_zhaoxinwen0271/20180909/401284.html, 2018年9月9日。

④ 夏立君:《明天比今天少一天》,《时间会说话》,第51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

也不怕了。人真能。”^①这种来自农民语言方式的感叹和肯定把人的价值推向了高处,而对于人本身的认可其实是对于生命可能性及创造力的认同。在夏立君散文创作中,作家也逐步从日常生活“此在”的小我书写过渡到对“彼岸”浩瀚历史大我的建构,在对古人生命的书写中,召唤出生命的无限性与可能性。如在《曹操:说曹操曹操到》里,作者以诗人、圣人之为曹操定性,其写作淡化历史对其奸诈、虚伪的负面评价,站在推动历史进程的立场上赞扬他的强力意志及雄壮气魄,肯定了曹操去日苦多中对于生命的延展和追求。《陶渊明:那一团幽隐的光明》里,作家对于陶子的生命也表示了认同,认为他是“魏晋生命审美的成功典型”^②,在对于田园梦和桃花源的诗学阐释中,用思想和精神承载其生命的无限和宽广。《李白:忽然来了个李太白》里作者提出了诗人的月光美学,通过解读几十首诗来展演李白飞扬恣肆的生命,在“了解之同情”^③的基础上肯定其对于立功、立言的个人追求。夏立君以古照今,通过赞颂古人生命能量来确证:即使生命各有长短,但是通过个人的创造性努力,生命可以走出时间的限度,获取时间之外的无限与永恒。

五、突围历史:生命于历史文化中的永生

对生命的探究超越对生命本体的理解,最终形成对生命价值的认识。生命价值观可以更宏观地反映出作家本人的生命态度。在《时间的压力》散文集中,作者通过解读古人价值观反观今人,并且将中国与西方的生命价值观互参,完成对于生命的深层观照。

夏立君散文里呈现的生命价值观有以下几个类型:第一类是选择将个体融合进集体中,强调自我对社会、国家的贡献,甚至不惜献祭、牺牲自己。如屈原忠君爱国、夏完淳舍生取义,作者站在缅怀崇敬的叙事立场上提取古人精神,将今之少年与古之少年进行对比,感叹先人的早慧;同时也并不讳言他们在践行其价值观时被扭曲的主体人格,即婢妾心态。但他要警示的是,人人都有可能为婢为妾,甚至甘愿为婢为妾,作者接续了鲁迅想做奴才及做稳奴

才的国民性批判。第二类是把个体生命和社会责任相互连接,但更强调个体对于自我、现实的超越,满足个人化的立言立功理想。司马迁用无根躯体著书,目的即是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曹操时动杀机,在作者看来也是为了拯时救世;李白更是个人生命觉醒的代表人物。作家由此认为当下人对生命观断章取义,才会呈现单向度的小丑曹操、奸臣曹操形象,表面上是为历史翻案,实则是在探究不同价值观的合理性尺度问题。第三类是将生命完全转化为隐的哲学,摆脱世俗欲望和自我实现桎梏,寻求本真天然的生命,不需要对外确立自己的生命价值,而是在自我建构中满足对生命循序渐进的认知。作者阐释陶渊明生命哲学对于后世的再生力量,将桃花源、田园梦赋形为“原型”意义上的生命价值观加以推崇。第四类是简化自己的精神维度,缺乏对于自我和他人生命的体恤,而是追名逐利、只为功成,代表人物为李斯、商鞅。夏立君散文中存在明确的批判性和对于前人反思的再反思,借此告诫人们生命价值观应该摒除部分功利性,不能让渡自我主体意识而成为他人的工具。

在对古人生命价值观的考辨中,夏立君从历史中突围出来,以当下视角审视古人生命,展现出中国人的超越性生命价值观,以及由此孕育而生的超个性的集体性生命伦理文化观,并在现代民族国家语境下,从传统的家国文化转化为新的民族国家生命伦理文化,古人鲜活却短暂的生命在历史观照中演变为可被观看、可被理解的生命观念,从而走向了永生,就此生命真正挣脱了时空的束缚,对抗了有限的肉体存在,升华为无限的精神永在,完成审美与哲学意义上的超越和重生。

另外,夏立君将生命观念历史化的同时,也完成了现代性接续,在当下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检验古人的生命美学。在《屈原:第一个独唱的

-
- ① 夏立君:《看人》,《时间会说话》,第31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
 - ② 夏立君:《陶渊明:那一团幽隐的光明》,《时间的压力》,第76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
 - ③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灵魂》中作者与余秋雨的“爱国论”商榷,反驳余氏片面荒谬的速朽说,拒绝以历史趋势质疑屈原的爱国精神,主张站在个体生命而非政治视角下评价古人的生命价值观,为屈原择取当代的超越性生命文化认同。《曹操:说曹操曹操到》在显性和隐性、官方和民间的双重视角下重申曹操生命价值观的影响力,以此检视当代中国人的取向。《李白:忽然来了个李太白》中将当代作家莫言的“解放”价值和李白相互参照,将其誉为李白式作家诗人,这源于两人叙事世界都反映出生猛、狂野、汪洋恣肆的生命情怀,古人的生命价值观被今人创造性地继承与转换。

夏立君还将这种生命价值观的考辨从中国延伸到西方,将中国古人与西方的生命价值观作对照,如古人认为生命的价值应该从内部开始建构,重视生命的内寻以获得精神的向上成长,所以陶渊明留给了后世田园梦,李白营造了月光美学,他们在历史中突围,获得某种永生的民族历史文化生命。作者通过比照,攫取到西方生命观的内求特征,即试图建立自足的精神空间以存放生命,海德格尔及荷尔德林同样具有类似中国的田园情结与怀乡病症候,以此佐证了中西生命价值观的交互性,通过对话从更深远的时空价值上确立中国东方式生命美学的存在形式及意义。

结语

夏立君的“时间”散文内置涵养心灵的生命哲学、美学思想,不仅在理论上接续传统,也为当代散文贡献了独特的创作价值。他建立了以“时间”为符码的生命哲学美学体系。“时间”散文写作贯穿了他的创作前期和转型期,前期

以个人体验、生活情思以及回忆为主的散文书写的是“个人时间”,是在非虚构之下对生命的真切玄思。以《时间的压力》为分界点,作家主动进入更宏阔苍茫的宇宙时空,以古写今,在“历史时间”洪流中捕捉生命的雄浑。与此同时,他也完成了个人与历史、“小散文”传统和“大散文”传统的合流。作为学者型散文作家,他的散文美感核心在于对生命本体的深刻思考和艺术化表达。作者立足生命哲学把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人的思想渗透到“大散文”中,形成独具特色的生命创作空间。他的“小散文”则用日常的经验诉说民间哲学真理,亲切质朴,具有稷麦气息,同样指向生命哲学的思考。由此作者以一种驳杂之象继承发扬了自古而来的综合性写作传统,呈现出历史、文化思想维度的综合性写作特征。夏立君散文在中国当代散文界独树一帜,其独特性就在于他不仅在思、史、诗三个维度阐释时间与生命的关系,也将土地之味和书斋之味互相渗透,让中西方哲学思想互相碰撞和对话,呈现出丰富的个体性、历史性、哲学性深度交融的生命美学书写。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与农村建设运动关系研究”(21& ZD26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新现实主义’审美书写研究”(19ZWB10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彭嘉凝,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张丽军,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